



# 闯关东精神 暨关东历史文化研究

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 闯关东精神暨关东历史文化研究

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 中国(齐齐哈尔)第七届关东文化旅游节 闯关东精神暨关东历史文化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

黑龙江省旅游局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齐齐哈尔市旅游局

齐齐哈尔市文化局

齐齐哈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中共齐齐哈尔市委政策研究室

齐齐哈尔市政府研究室

齐齐哈尔市城投公司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

齐齐哈尔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 闯关东精神暨关东历史文化研究

---

印 刷 齐齐哈尔慧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79 千字  
印 数 400 册  
出 版 黑新出图内字(2009)B006 号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编 辑 说 明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得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就是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绚丽多彩。

从商周，迨两汉，再到明清，东北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特别是明朝以后，“关东”便成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东四盟的泛称。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关东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齐齐哈尔是关东文化核心区域之一，拥有异彩纷呈的关东文化、淳朴浓郁的关东风情和富饶奇特的关东物产，使得这里更具有浓郁而奇特的关东文化特征，成为国内外学者、游客考察、研究和体验关东民族民俗文化的必到之地。齐齐哈尔市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为发掘关东文化，整合东北三省一区以关东风情为特征的旅游资源，积极打造具有关东文化特色的旅游品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举办“闯关东”精神暨关东历史文化论坛，是中国（齐齐哈尔）第七届关东文化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其宗旨是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就关东文化内涵、关东地域界定、历史沿革和闯关东精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专题研讨，进一步弘扬闯关东精神和关东文化，为推动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本次论坛活动，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省社科院领导高度重视此项活动，组织专家参与课题研究，向会议提交了5篇高质量的论文。我国著名文史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景爱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德金先生、李大龙先生，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关东文化大辞典》主编李治亭先生，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魏国忠先生等专

家，欣然接受会议邀请，并在百忙之中亲自撰写论文，对本次论坛的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有力的指导，使我们深受感动。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听取论坛筹备工作汇报，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使论坛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同时，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市社科联有关学会的专家学者积极撰稿、参与论坛各项筹备工作，使本书从约稿到编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得以顺利完成。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闯关东精神暨关东历史文化研究》一书是从提交本次论坛的几十篇论文中选出编辑而成的。编者本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原则，对收录的论文未做改动，仅供论坛研讨、交流，不当之处敬祈专家赐教。部分优秀论文因提交的时间关系等原因未收入，敬请谅解。我们将在会后通过编印专刊等形式予以刊发。编辑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参加论坛研讨论文的一个集成，更希望能给关注关东历史文化研究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带来一些思考，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关东历史文化和闯关东精神的研究上来。相信，通过本次论坛的召开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必将对深入发掘关东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关东文化特色品牌、推动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特别是推进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编 者

2009年2月



## 目 录

关东文化简论·····	景 爱( 1 )
关东文化论·····	李治亭( 6 )
关东与关东文化·····	李大龙( 18 )
黑龙江历史的特色·····	魏国忠( 22 )
论关东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征与现代化转型·····	董鸿扬( 29 )
闯关东精神的实质、内涵及特征·····	刘伟民 孙浩进( 38 )
闯关东精神是黑龙江发展宝贵的动力资源	
——关于挖掘和弘扬闯关东精神的调研报告·····	王爱丽( 44 )
民族精神与时代的契合	
——试谈闯关东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安会茹( 51 )
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	赵阿平( 57 )
简述清代黑龙江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信仰·····	周喜峰( 64 )
关东文化浅议·····	董驹翔( 69 )
关东文化之齐齐哈尔古代文明·····	李 龙( 75 )
闯关东的历史背景及对齐齐哈尔开发的影响和作用·····	王延华( 81 )
关东冰雪文化与齐齐哈尔名称·····	杨玉清( 84 )
浅谈闯关东的精神实质和内涵·····	孙 仁( 88 )
齐齐哈尔主要关东文化品牌及其保护与利用·····	孙文政( 92 )
关东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策略探究·····	张海鹰( 98 )
关东文化和关东文化节·····	傅惟光( 103 )
把闯关东精神转化为推动我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周 伟 张全智 李云峰( 111 )
关东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吴丽华( 116 )
闯关东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何 强 李华忠( 120 )
论闯关东精神与东北振兴·····	李允光( 123 )
弘扬闯关东精神创建创业型城市·····	张振笋( 127 )
大力弘扬闯关东精神 培育与时俱进的创业文化·····	戴云峰( 132 )
简论关东文化的历史地位·····	黄志强( 139 )
浅议关东文化产业化与齐齐哈尔城市营销的实现策略·····	吴庆华( 143 )
关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温向前( 149 )
关东文化地域界定·····	王 光( 153 )
流人文化对黑龙江文化的影响·····	郑彦春( 156 )



对关东文化的一点思考·····	曹 扬(161)
闯关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东北现象”·····	李晓东(164)
闯关东路艰辛创业精神照后人·····	张明慧(167)
关东文化的产生、内涵及发展形式传统·····	李亚飞(173)
闯关东精神就是求发展精神·····	张旭东(177)
打造个性化关东文化 提升齐齐哈尔文化软实力·····	王俏梅(179)
关东第一艺 精彩二人转·····	王树声(183)
关东文化内涵的旅游应用·····	崔 杰(187)
浅析闯关东的历史文化·····	吴 宏(190)
站人文化的移民特征分析·····	许 铭(193)
关东话与普通话的差异及亲缘关系·····	池 洪(197)
齐齐哈尔胡同·····	张 港(205)
王宪章故居随想·····	刘沛霖(211)
关于齐齐哈尔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考·····	王浩捷(214)
试谈齐齐哈尔在关东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王 超(220)
浅谈满汉交流中的满族手工业变迁·····	黄新亮(224)
悲壮的生存抉择与历史跋涉 ——闯关东社会现象纵横谈·····	蔡 军 唐守祥(231)
站人的习性·····	姜 黎 张 丽 宋振龙(235)
站人的语言特色·····	宋振龙 姜 黎(241)
站人的农耕文化·····	张 丽 姜 黎(243)
传承发展鹤城文化丰富繁荣关东文化·····	张志臣(245)



# 关东文化简论

景 爱

关东的说法由来已久，关东文化却是近年新提出来的。如何认识关东文化，是开发利用关东文化的前提。对此我缺乏深入研究，只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想法，向方家学者请教。

## 一、汉唐时期的关东

关东是一地理概念，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当时将函谷关（在河南宝丰县）、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城）以东地区，称作关东，属于地理上的泛称。《史记》载：“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sup>[1]</sup>这里所说的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有关东就会有关西，于是晋代出现了关东、关西的说法。《资治通鉴》记载，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有言说：“若氏运必穷，吾当环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sup>[2]</sup>这里所说的关东，指中原地区；关西指关中地区。

到了唐代，关东这种说法仍然存在。不过这时的关东已不是泛称，是专指洛阳一城而言。陈熙晋称：“唐都关内，故以洛阳为关东。”一些诗词也是以洛阳为关东，如王勃《春思赋》：“复闻天下幸关东，驰道烟尘万里红”；骆宾王《畴昔篇》：“忽闻驿使发关东，传道天波万里通”。诗中的关东均指洛阳城而言，关东已由泛称变成了洛阳的专称。

## 二、清代的关东

清代以山海关以东为关东，这种说法多见于民间和诗词之中，在官府文献中几乎见不到这种记载。郑板桥《潍县竹枝词》：“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康有为《过昌平城》：“永夜驼铃传塞上，极天树影递关东。”

清代关东说法的出现，与明代修山海关和边墙有关。从中原地区沿辽西走廊北上有一古道，榆关（渝关）是必经之地，其故址为今河北抚宁县榆关城。辽金时期抚宁县变成了内地，榆关失去了作用而废弃，成为驿路上的站点。《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榆关并无堡障，但存遗址，有居民三数家。”<sup>[3]</sup>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的兀良哈三卫构成了巨大威胁。故而徐达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了山海关城，仍有榆关之称，不过是在榆关以东倚山濒海的地方选的新址。明代中期以后，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北京延庆的蓟镇边墙，山海关成为从中原到东北的主要通道和关城。

不过明代似无关东的称呼。到了清康熙年间，对东北地区采取了封禁政策，除山海关、蓟镇边墙以外，又修建了柳条边，严防关内的汉族人进入东北，保护东北的自然资源。即





使是官员因公出关，也要经过申请，取得关票才能出关。据《柳边纪略》记载，旗人出关“须本旗固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出关“则呈请兵部或随使印官衙门起汉文票”。<sup>[4]</sup>对于普通的黎民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取得关票，只有冒险偷度，被称作“闯关东”。如果闯关不成被发现了，会处重刑或死刑。“闯关东”的人以山东、河北、山西居多，许多无地的农民和灾民无以为生，只好“闯关东”去谋一条生路。

关东一词，是“闯关东”的人提出来的，他们习惯于把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称作关东，把出关称作“闯关东”。因此，在官方文献中很难见到关东、“闯关东”的记载。

### 三、“闯关东”的由来

“闯关东”的出现，与清朝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有关。

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以后，使很多满族人“随龙入关”，造成东北地区人口剧减，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有许多土地荒芜。因此，顺治十年（1653年）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招关内农民出关耕种，辽东、辽西的荒地得到了开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出关者主要是山东、河北的农民和吴三桂旧部，还有一些罪犯被流放到宁古塔、卜奎、船厂、伯都讷等地，被称作流人。

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廷又废除了“辽东招民开垦例”，禁止汉族人出关耕种。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东北的自然资源（人参、貂皮、鹿茸、东珠），保存满族人的尚武习俗，防止他们汉化，严令汉族人出关“永行禁止”。<sup>[5]</sup>为达到此目的，在老边的基础上，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增修了新边，被称作柳条边。到了乾嘉之世，封禁更为严厉：“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并行山东、江、浙、闽、广五省督抚，严禁商船不得夹带闲人。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sup>[6]</sup>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全面封禁吉林，“永行禁止流民，勿许入境。”<sup>[7]</sup>嘉庆八年（1803年）下令：“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田亩，妨碍旗人生计……着直隶、山东各督抚接到部咨，遍行出示晓谕，以见在钦奉谕旨敕禁民人携眷出口。”<sup>[8]</sup>这类以朝廷名义发出的禁令很多，限于篇幅，不一引证。这种封禁政策，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

这个时期关内的土地兼并加剧，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水旱灾害不断发生，无以为生的直、鲁、晋流民，只好采用各种方式冲破关禁，挺而走险，偷度到关外谋生，这种违禁出关的活动被称作“闯关东”。“闯关东”很危险，有些人因此而丧生，“闯关东”需要胆量和智慧。到了道光以后，由于同外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清政府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只好有步奏地解除封禁，允许关内农民到关外谋生，出关成为合法行为，也就不存在“闯关东”之说了。

### 四、关东文化的地域范围

关东的地域范围，至今未见科学的论证和界定。应当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东是以地处山海关以东得名，则关东主要是指辽东地区，即明清人所称的辽左。辽东地区也是“闯关东”的流民最早到达的地区，早期的关内流民，多半栖息于辽东。关东



指辽东而言，可以说是约定俗成，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俄国人、日本人租借（占领）辽东半岛以后，将这里称作关东州，日军派驻的军队称关东军，都是以地处山海关以东得名。这是狭义的关东。

实际上，随着清代出关的流民不断增多，辽东已无法容纳，有些流民进入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在流民看来，这些地方也属于关外、关东，这是广义上的关东，是泛称。我曾多次到内蒙古东部考察，当地有一部分汉族人说，他们的祖先是“闯关东”过来的，反映出了他们对关东的认识。

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关东文化的范围也是如此。今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大多是汉族“闯关东”的流民之后。只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关内的新移民，他们入乡随俗，与清代来的汉族人，已无差别。

### 五、关东文化的内涵

关东文化属于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关东文化实际是少数民族文化加汉族文化，它具有多民族及多民族文化的特点。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其民族可以分为肃慎、鲜卑、扶余三系。渤海、女真、满族属肃慎系；契丹、蒙古属鲜卑系；高句丽属扶余系。渤海、女真、满族、契丹、蒙古、高句丽在历史上均称建立国家。高句丽都辑安丸都城，渤海都宁安渤海城，契丹都林东上京城，女真都阿城上京城，后金都沈阳城。因此，在东北地区留下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古迹文化。

在战国以前，汉族人就进入了东北，燕国设辽东、辽西郡，辽、金、清三代是汉族人进入东北的高峰期。汉族的进入，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使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打上了中原的色彩。例如，渤海上京、辽上京、金上京、后金盛京，都是模仿中原都城而建，契丹文、女真文都是模仿汉文而制。甚至陵墓的修建，也受到中原的影响。至于农业、手工业，那就更明显了。

地域文化的产生，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四周环山，中间是大平原，江河湖泊密布。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既有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又有森林狩猎民族和渔猎民族。因此，关东文化具有千姿百态的特点。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在冰天雪地的条件下，创造了冰雪文化，蒙古族的祖先室韦人，“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sup>[9]</sup>所谓“骑木而行”就是乘滑雪板而行，这是最早的冰上运动。后来出现了爬犁、冰灯、冰雕、滑雪，冰雪活动成为最具地方特点的关东文化。

森林多树，桦树皮可以制做器具。在扎赉诺尔鲜卑墓中有桦皮器，桦树皮铺垫墓室；达斡尔人用桦树皮制作小船、摇篮、箱盒等生活器具，极具地方民族特点。这种以桦皮作为生活用品，被称作“桦树皮文化”。

女真人喜养猪，猪是主要食物之一。据宋朝使者记载，女真人喜欢吃肥肉片，称大软脂、小软脂，又喜欢吃猪的内脏、凝血，称作“心心脏”，合芥子、韭菜、醋而食。<sup>[10]</sup>这种吃法就是后来满族人的肥肉血肠，今日所称的“杀猪菜”。



女真人喜欢“油煮面食，以蜜涂拌，名曰茶食”。<sup>[1]</sup>油煮面食，就是油煎食品，与今日的油炸糕、油条、油炸糖耳朵相似。今日东北的油炸食品，即源于此。油炸食品抹上蜂蜜，发热量高，是最理想的北方御寒食品。

赫哲人以渔猎为生，吃生鱼片，穿鱼皮，被称作“鱼皮靴子”。他们在金代就出现了，属于女真人的一支，其生活方式到了今日仍然可以见到若干残迹。

至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至今依旧，没有太大改变。

### 六、关东文化的开发利用

关东一说是清代出现的，不过关东文化不能限于清代，它应当包括历史上各族文化。关东文化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非物质文化。在开发利用关东文化资源时，必须明白这一点。

高句丽好大王碑、将军墓、龙潭山城、五女山城，渤海上京龙泉府、贞孝公主墓，辽代塔子城、呼伦贝尔边壕，金上京城、蒲与路故城，明阿什哈达摩崖石刻、松花江造船厂，沈阳清故宫和三陵（永陵、福陵、昭陵），都是著名的古迹，属于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当加以开发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可再生资源，应当成为开发利用的重点。山野菜（木耳、蘑菇、蕨菜等），黏食（黏糕、黏豆包、驴打滚等），大豆制品（豆腐片、素虾、素鸡），都是东北特产，应当大力开发利用。北京有大东北酒家，是以东北特产为主，很受北京人欢迎。东北的山野菜、黏食、大豆制品，在北京一年四季畅销不衰。

东北的戏剧、曲艺具有粗犷、豪放、热情的风格特点，而且历史悠久。据研究，东北二人转是从金上京地区的臻蓬蓬歌演变而来。<sup>[2]</sup>赵本山的小品源于二人转，现在已形成产业集团。东北的评弹大概源于本地，后来发展到天津、北京，形成了评剧。讲评书的单田芳、刘兰芳，都是辽宁人。东北大秧歌火爆、热烈，北京节日和商店开业，都有秧歌队助兴。《风刮卜奎》应拍成《走西口》那样的电视剧。旅游文化是必不可少，要配合旅游演出，就像内蒙古旅游点上唱蒙古情歌、青海湖旅游唱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以欢快的歌声欢迎游人，会给游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使他们二游三游，成为“回头客”。

为了开发关东文化，必须树立关东文化的品牌。北京称东北的米糖为关东糖，还应当有关东糕、关东黏包、关东菜，凡是东北名优特产都应冠以关东字样。这本身就是文化宣传。如果关东品牌能打出去，在市场上站住脚，何愁产品无销路？因此，应当加强关东文化的挖掘和研究，除文化人士以外，企业家也应当参加。因为产品的开发必须有企业家参与，最后形成研制、产销一条龙的局面。为振兴东北的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

### 注释：

[1] 《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2768页。

[2] 《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704页下栏。

[3] 《大金同志》卷40，中华书局校证本563页。

[4] 《柳边纪略》卷1，辽沈书社影印本238页上栏。

[5] [7] 《东华续录》乾隆41。



- [6] 《大清会典事例》户部7，户口。
- [8] 《东华续录》嘉庆15年。
- [9] 《隋书》卷84，《契丹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883页。
- [10] 《三朝北盟会编》卷20，宣和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43页上栏。
- [11] 《三朝北盟会编》卷20，宣和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44页下栏。
- [12] 郭长海、赵人：《二人转起源新证》。《辽金史论集》第10辑241~2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景爱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 关东文化论

李治亭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鉴于历史渊源、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及风俗、语言诸方面差异，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不仅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也积蓄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区域文化。诸如，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州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齐鲁文化、以四川为中心的蜀文化、以山西为中心的晋文化、以两湖为中心的荆楚文化、以福建为中心的闽粤文化等等。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民族混居，亦形成以辽宁为中心，含盖吉林、黑龙江，与中原内地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东文化，她以刚健、壁立千仞的气概崛起于东北，独树一帜，同其它地区异彩纷呈的文化交相辉映，并驱争雄。

## 一、关东文化的地域界定

当我们探索关东文化的时候，首先应明确她的地域概念。所谓关东，简单地说，是指矗立于今河北与辽宁临界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以东的地方，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之地，换言之，概指东北地区。又以山海关为界定，则有关里、关外之别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特定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区域概念。例如，西汉、隋、唐等朝建都长安，以函谷关为限，京畿地区称关中或关内，关以东为关东，或泛称山东，意指太行山以东，非专指今山东一省之地。当其后的王朝离开此地，另建新都，如宋建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元、明、清建都北京。随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大转移，原有的区域概念随之而变迁，逐渐淡化，以至消失。与此同时，人们对某些地区便赋予新的概念和名称，专指东北三省的关东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区域概念的成立，却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更与长城及山海关的修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所周知，北方段长城，始筑于战国时期的燕国，是为防御东胡入侵而设的。这段长城，约起自张家口，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东经河北围场，自赤峰进入辽宁省境。历建平、北票、阜新、彰武、法库，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直达鸭绿江畔<sup>[1]</sup>。燕长城长达2400余里，几乎把现今辽宁全境包括在这道长城以内，并首次设辽东、辽西两郡，自此，辽（东）即成为今辽宁的代名称。秦始皇集战国主要是燕、赵等国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史记·蒙恬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仍把辽东大部划入长城内侧，今吉林、黑龙江则处“塞外”之地。

汉代以降，经魏晋南北朝，迄至隋、唐、宋、元，历朝所修长城，不过在长城的基础上，或增补，或有所延长，其格局无根本性变化。引入注目的是，取得北中国半壁江山的



金朝，在东北加筑长城二道，其一长千余里，其二长三千余里。分别称为“兀术长城”或“金源边堡”、“内长城”或“金壕堑”<sup>[2]</sup>。这两道长城正对着西北部的蒙古草原，是针对蒙古这支游牧民族侵而设的。从长城的总体而言，它是对秦长城向东北的延伸，把现今东北三省及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等都囊括在这两道长城之内。因此，金代东北与内地自无内外之分。

这种状况，至明朝才为之一变。终明之世，先后遇到两个劲敌，即蒙古人和女真人。为防御他们，明建国伊始，就沿袭历代所修长城，重新全面整修，迨至明亡前夕，还在继续长城的土石工程。对关东区域的界定，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修建山海关。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在此创建关城，设山海卫。这座关城，与万里长城连接，浑然一体，背山临海，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关城的位置，恰好处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锦州抵关城，长约400里，背靠医巫闾山，前临渤海湾。于山海之间仅一线之通。这一狭长通道，位辽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山海关象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被称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明视山海关如命运所系：“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吃紧处。”<sup>[3]</sup>

山海关城的修建，第一次把华北与东北截然分开，自此便成为两大地区的天然分界。“关东”区域的概念，自山海关建成后，便逐渐形成。开始专指辽东，称为“关外”；“畿东”、“京东”、“东陲”、“关之东”，都是“关东”之意。这些称呼，在明清官书如《明实录》、《明史》等典籍中反复出现。也惯称辽东，又独称“辽左”，盖指其地居京师左侧，视同人之左臂，不可或缺。入清后，满族统治者以长城内外皆属一家，不再修长城<sup>[4]</sup>，但保留山海关，一则稽查商旅，一则更主要的是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保护其“龙兴之地”免致破坏。山海关与其相连接的一段旧有长城，便成为东北地区与内地之分的严格界限。约自康熙以后，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文件、史书及时人著述，“关东”渐成通行之称。如，康熙时流寓辽东的王一元著《辽左见闻录》，内记三藩家口发配到东北时写道：“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载：江苏太仓一艘商船前往“关东载豆”。其后，历年所记东北之事，皆书“关东”。《清史列传·李金镛传》把身任吉林省长春厅通判的李金镛誉为“关东循吏”。清末，官至黑龙江都督的宋小濂作《北徼纪游》，皆以“关东”名东北。《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命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兼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事务。“东三省”之称自此而定，或简称曰东省，如同现今泛指东北，但人们仍习惯称关东。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东北地区名称种种，屡经变化。除上述名称，还有以方位名之，如《周礼》、《尔雅》、《山海经》、《淮南子》等先秦典籍中，皆以方位直书“东北”；或以区域立义，如《辽史》、《金史》等书，以设“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等机构名东北。又有异名者，如称辽海、安东、盛京等，同“辽东”含义一样，用以泛称东北之地。这些名称，皆系一个时期所用，不能行之久远。唯“关东”发端于明筑山海关之后，而盛行于有清一代，延及民国时期，标志着关东作为区域的概念不仅正式形成，且已深深注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解放后，我们沿袭历史形成的格局，曾把东北作为一大行政区，



其分界大致以山海关为界，不过是对历史的认同。

显然，“关东”的区域概念，并非是人为了硬性规定，却是历经千百年的演变而后形成的。尽管现今作为统一的行政区划已不复存在，但关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三省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无门庭之限，资源共拥有；同处中国东北部边疆，各民族杂处，历史上虽然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水平不一，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为依存，生活习俗与文化互为渗透、靠拢，因而形成共同的地域心理。他们共同创造历史，以致历史上不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都不能把他们任何一方分离出去。这些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共同的历史背景，就使东北这一辽阔的土地，宛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自成一经济与政治区域，自然也有其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关东与东北，其义为一。本文以“关东”冠题，意欲再现东北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给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 二、关东文化的起源

当人们追溯中华文明开创史，论源头必称黄河（有的甚至具体说到河北涿鹿），追先祖必宗炎黄。诚然，黄河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伟大摇篮，她以博大的胸怀，吸收了无尽的文化营养，积淀成以她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炎黄和他们的子孙就是在这一广大的黄土地上开天辟地，写下了中国漫长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页。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离他们遥远的地方，也已或正在出现文明的新曙光。北自黑龙江沿岸、辽河流域，南至长江、珠江诸江河流域，都有我们的先民在生存、在开创，那里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源的，故其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各开一朵的盛况。而最终融汇到黄河这一主流，成奔涌澎湃之势，奏出人类文明的最辉煌的乐章。关东文化是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认定关东文化或南来于中原，或北来于西伯利亚，似乎说，关东原无文比，皆系外部传入。其实不然，关东文化同她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文献无征，只有以考古资料来证明。地下出土文物代表的年代，应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久远的无可争辩的标志。在过去40多年中，特别是近10余年，关东地区古人类化石和遗址的大量发现，向我们揭示了该地区远古文化的灿烂的景象。

从最北的黑龙江右岸塔河境内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晚期遗址，到最南的辽东半岛南端的复县古龙山洞穴文化遗存，东至乌苏里江左岸的饶河小南旧石器遗存，在辽阔的关东大地上到处都留下关东先民活动的足迹。诸如金牛山人化石（辽宁营口市永安乡）、庙后山人（辽宁本溪）、安图人（吉林安图县明月镇）、榆树人（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建平人（辽宁建平县南地乡）、前阳人（辽宁丹东东沟县）、哈尔滨人（该市南郊阎家岗）等化石，以及辽宁海城仙人洞、大凌河畔鸽子洞等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遗址，共30余处。经测定，距今最远者为金牛山人化石，达28万年；最近者为1、2万年即前阳人化石。在关东各地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基本上已反映出人类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大发展阶段<sup>[5]</sup>。

考古科学的实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距今30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开始生息在关东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其起源和分布，已经证明这些原始人类是关东土生土长的“土著”，并非是从“外域”迁来的“移民”。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学术界甚至断言东北不存在古人类，或以为长城以北也不存在旧石器遗址。所有这些非科学的结论和脱离实际的描述，都被东北不断的考古新发现而一再改写。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关东地区不仅有着同中原地区相媲美的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而且也是人类向东北亚、北美迁移的重要通道<sup>[6]</sup>。

但是，所有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遗址，并不意味着都是文明与文化的发源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sup>[7]</sup>譬如赛场上，开始时都处在同一起点，其后才因各自具体条件的差异而有快慢、迟速之分，有的甚至半途而废，用史学语言说，就是消亡或消失。在关东，哪个地区哪部分原始先民捷足先登，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恩格斯语），文明的新曙光就随之闪现出来，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就从这里发源。

在关东，考古学终于为我们发现了她的文明与文化的发源地，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属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坛庙冢。早在1979年5月，考古学家在辽宁西部喀左县城东4公里处东山咀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石砌祭坛遗址。东山咀祭坛，无论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还是仰韶文化中，都不曾发现过。考古学家认为，东山咀祭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即循此线索继续查找。到1983年，在距东山咀50公里处，辽宁建平、凌源交界处牛河梁村，不出所料地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还有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出土有陶质妇女裸体小塑像、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女神彩塑头像、大小不等的泥塑女性裸体像残块、成批磨制的动物形玉饰、石饰，尤以龙形玉饰弥足珍贵。还有，供祭祀用的陶器，数量十分可观，其中有胎厚1.3厘米的彩陶大器残片，堪称“彩陶王”。上述文物，制作精美绝伦，世所罕见。经测定，这一文化遗址距今5500年左右。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顿时震惊中外考古学界。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玉龙，向当今世界展现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时代风貌。考古学家一致认定：“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夏以前将不只是传说。我国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把它称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是恰如其分的<sup>[8]</sup>。

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第一次突破了多少世纪以来已形成的历史观念，真正复原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本来面貌，重新改写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它生动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多样性，而它本身则代表了一种文化体系，即考古学家所称的北方古文化体系。顺着辽宁境内的大凌河、西辽河，向南一直延伸到河北中部，而高度发展的仰韶文化则代表中原古文化体系，是从华山下沿汾河，直至桑干河的河北省西合营<sup>[9]</sup>。由此可见，牛河梁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无可争辩地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不可估量的价值。

不仅如此，牛河梁文化遗址的发现，还为我们真正寻找到了关东文化的源头。迄今已发现的所有考古材料显示，旧石器时代特别是早、中期文化遗址，多集中在关东南部辽宁省境内，因而为文化的起源和最先爆发文明的火花奠定了初基。辽宁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地带，气候适宜，动植物生长繁茂，亦利于先民们生息繁衍。牛河梁所在地区，属于大





凌河流域的源头，河谷平原、丘陵、山地纵横交错，水草丰茂，亦农亦牧亦猎，各有其宜。邻界河北、内蒙古地带，构成文化的交汇之区。因此，中华文明的火花在此撞击而出，照亮了远古关东的漫漫长夜。

在牛河梁文明出现前后，现今已知的新乐文化（沈阳）、小朱山文化（大连）、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敖汉旗）、左家山文化（吉林农安、德惠）、元宝山沟文化（吉林农安）、富河文化（内蒙古巴林左旗）等，相继出现在辽宁、吉林及界邻辽宁的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面貌与红山文化基本接近。这表明，关东远古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序列和内容，而以牛河梁文化发展的程度最高，所说“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恰好说明它已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于是，整个关东文化都处于它的巨大光辉照耀之下，同中原黄河文化相辉映。因此，牛河梁或称辽河流域文化不只是关东文化的发源地，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所有认为关东文化为“外来”文化的种种议论，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主观臆说。

### 三、关东文化的发展阶段

关东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开天辟地，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关东大地，已历百代沧桑变迁，自成一文化体系，并在其发展中，显示出她的阶段性，各具一代风采。关东文化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远古至先秦时期。这是关东文化萌芽与诞育时期。同黄河流域文化一样，以旧石器、新石器—彩陶及商周青铜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关东各地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如小河沿文化的图画文字符号、东山咀与牛河梁陶塑人像与玉器的雕刻艺术、白岔河文化的岩画（辽宁西喇木伦河支流）、莺歌岭的动物陶塑（黑龙江宁安）、喀左与义县（辽宁）的青铜文化，已出土的蟠龙鬲、俎形器等为中原铜器所少见；辽西已发现的乐器石磬，可证夏商时期关东音乐、歌舞也已产生；从陶罐到铜器所刻铭文，遍布关东各地，与商周通行的甲骨、金文大类相似，或者完全相同。远至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的渔猎文化，独具特色，熠熠放光，并向商周统治的黄河流域不断输出。此一时期，关东南部的农业经济文化与北部的渔猎、游牧文化并立，与黄河文化同步发展，正在孕育本区域的特有文化。

第二阶段，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关东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时期。秦并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大一统的新纪元，汉继其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秦开创的大一统，融汇成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和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同时，居住在长城外的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挹娄、勿吉等民族相继登上关东的历史舞台，竞相发展。汉晋之际，中原大乱，一方面，大批汉人或南下，或北徙，避乱辽东；一方面，关东诸民族变得强盛，逐渐向内地移动，如鲜卑族进入长城以内，同匈奴等族占据黄河流域，形成“五胡十六国”的政治新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运动，其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汉文化以空前的规模和广度向关东传播、扩散。许多儒学名士流入辽东，从事讲学活动，充当了汉文化的传播者。如管宁“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邴原居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国渊“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sup>[10]</sup>这种讲学活动，实为办教育之始。关东佛教之兴，肇始于魏晋时期，而盛行北朝。辽宁义县所